

钱杭 承载 著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史丛书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钱杭 承载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编辑：汪维玲

责任校对：朱晓阳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钱杭 承载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谢村电厂路)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4 万

1996 年 3 月第 一 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

ISBN 7-213-01168-5/K · 310

定 价：14.50 元

主编 蔡少卿

编委 孙 江 李良玉

编 序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科，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功能；与此相观照，以再现过去为本旨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体现了当代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历史认识的整个过程而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语）。由传统史学脱胎而出的社会史研究，正是以其整体史观的新姿，强调对历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它既涵盖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关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的研究，从而进行人类历史景观的模拟复原，使之客观准确地成为检测现代社会的参照。

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尚处在摸索起步阶段，如何展开中国社会史研究，尚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合作努力。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社会史丛书》，希冀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顾名思义，这套丛书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它涉及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等方面。它对我们今日认识国情，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将大有帮助。

我们深知，仅仅通过这套丛书，决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即使所出的著作能否达到社会史学科所规定的要

求，也还有待专家的评判。故此，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和学者们给予批评指导。

《中国社会史丛书》编委会

前 言

一翻开目录，读者就会发现，本书叙述的是一个时期（17世纪）、一个区域（江南地区）中的一些平凡人和平凡事。照理说，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10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结果，一个衰朽的王朝崩溃了，消失了，一个新兴的帝国诞生了，巩固了——历史的叙述应该抓住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声情并茂地描绘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从而总结出深刻惨痛的教训，以此打动性喜悲壮崇高的读者的心。这当然很好，很必要。然而可惜的是，一部活的历史就像现实生活一样，并不全由激动人心的高潮构成，其中更多的是平淡如水的细节，和无波澜可言的日常琐事，在“英雄们”（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一些场面上的人物）努力创造着“辉煌”业绩的同时，普通人却仍在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地生活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虽然也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不再平静，但毕竟与社会表层的翻滚腾跃不同，基本上遵循着自己原有的一套运行规则和节奏。

我们现在应该多关心一下这些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关心一下那些只属于个人所有的私人生活空间。历史发展的基础毕竟是由他们的生活以及基本的需要构成的。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就整体说来，实在并不比“英雄们”少。如果不能尽可

能充分地了解这些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就显然是不完整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平凡人和平凡事该不该写早已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键是怎样才能把平凡写好。在这里，中国史学界面临的困难可能要大大超过国外的同行。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史学有一个过于重视辉煌业绩的传统。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载并非不注重平凡的社会生活，有的还颇为详尽有趣。但显而易见的是，与对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偏好比较起来，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对社会生活加以“系统的”注重确实非常不够，也就是还没有很认真地把对历史上各种平凡生活的整理和研究，看做构成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不入大雅之堂的野史。第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者来说，无论关注的是哪一个领域，都十分迫切地希望去抓“大事”，都希望通过自己的钻研最终发现一个足以概括全局的规律，至少应该成为发现这个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概言之，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平凡”很少被当成研究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被作为一个手段，或者跳板。史学研究摆脱不了为隐于其后的某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目的提供服务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也同样不习惯将正面描写日常生活作为自己本来目的之一。如果写宴会，不是刀光剑影、暗藏机心的鸿门宴，就是王婆、潘金莲与西门庆一起吃酒，总是作为忠奸、贞淫斗争的一个环节来写。以“不平凡”的目的和“不平凡”的心态来写平凡，或许就是使这个问题变得困难重重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愿意平实地描写和研究历史上各种平凡的人和各种平凡的事，我们不为这种研究设定其他外在的目的。研究行为本

身应该就是研究的目的，至少是主要的目的。

本书以下各章所记录的，只是17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各章之间一般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们也没有试图去建立类似的关联。同时，在选题方面亦出现明显的偏爱，那就是较为重视江南的文人和江南的文化。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兴趣，以及我们掌握的资料在这几方面较为集中的缘故。“社会生活”的研究当然一定会远远超出本书涉及的范围。

就像所有真正的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一样，史学研究也应当提倡充分地体现出作者的个人风格和个人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更应该是一个沉思着的作者在追抚今昔、感慨人生时的心灵独白。过于热衷地去追求一个人造体系的严整性，为了一个外在目的而牺牲精神创造的主动性，是前述那个“情结”的又一表现。

本书绪论、第一、第二、第三章，由钱杭撰写；第四、第五章，由承载撰写。

全书由钱杭最后改定。

作 者

1994年9月于上海

目 录

1	前言
1	绪论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历史定位
1	一、江南的区域范围
2	二、江南的政治地位
12	三、江南的经济地位
24	四、江南的文化地位
36	第一章 江南的文人社团
36	第一节 社团概况
38	一、具有政治倾向的社团
41	二、一般的文人社团
45	第二节 社团的组织
45	一、组织结构
51	二、成员关系
59	第三节 社团的活动
59	一、集会
67	二、政治活动
80	三、其他日常活动
91	第二章 江南的宗族和宗族生活
91	第一节 江南宗族的几种类型
95	第二节 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

108	第三节 宗族对族人的教化和辖制
109	一、教化
115	二、辖制
129	第三章 江南的造纸、印刷和图书收藏
130	第一节 江南的造纸业
130	一、分布和规模
135	二、纸张的品种和制造技术（附：墨和墨汁的制造）
145	第二节 江南书坊业的分布和发展
165	第三节 江南的藏书楼和藏书家
166	一、藏书楼分布
168	二、藏书家类型
170	1. 著述型
175	2. 校勘（出版）型
182	3. 收藏型
185	4. 赏鉴型
189	第四章 江南的艺事文风
190	第一节 文苑诗坛
192	一、有从政经历的诗人作家
196	二、布衣诗人
198	三、妇女诗人
200	第二节 通俗小说和民间歌谣
201	一、通俗小说
209	二、民间歌谣
214	第三节 戏曲、戏班及其社会影响
214	一、戏曲演唱
217	二、戏班和演员

227	三、戏剧演出对江南民众生活的影响
237	第四节 翰墨丹青
237	一、江南的书画家与画派
240	二、江南书画家的生活和创作
245	三、文人书画的社会传播
251	第五章 江南人的衣食住行
251	第一节 服饰俗尚
261	第二节 饮食习惯
262	一、岁时饮食
270	二、江南的宴饮风气
274	三、茶风和酒事
283	第三节 居住和行旅
283	一、江南的住宅
287	1. 徽派民居
291	2. 江浙水乡民居
295	二、江南园林
304	三、出游行旅
305	1. 游历考察型
309	2. 求学问道型
314	3. 谋生型
318	后记

绪论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历史定位

一、江南的区域范围

本书所说的“江南”范围，大致上依明代和清初的行政区划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而定。明代的“江南”，包括了以下地区：

南直隶 14 府：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4 州：广德、徐州、滁州、和州；

浙江布政使司 11 府：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

江西布政使司 13 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赣州、南安（尤以前 6 府为主）。

在清初，“江南”主要是指：江南省（清顺治二年，即 1645 年，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清康熙六年，即 1667 年，始分设江苏、安徽两省）、浙江省和江西省。

这个地区，在地理范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海地区和赣江流域。如按现在的省（市）级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四省一市。

二、江南的政治地位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位日趋提高，到明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六朝以后，南宋曾经在浙江临安建都达150年（1127年至1276年）。此后到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起大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封建王朝的首都，建立在长江南岸的应天府，不久命名为“南京”（朱元璋曾有迁都北宋故都开封的打算，将开封府定为北京，所以称应天为南京。洪武十一年，取消开封府“北京”的称号，南京正式改称“京师”）。在明太祖在位的31年间，他两次大规模营建南京。第一次始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迄于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修筑的工程包括宫城（又称紫禁城）、皇城和京城，其中京城方圆达96里。第二次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主要修建南京的外城，周围达180里。经过这些工程，南京成了一座雄伟坚固的帝宫，其城墙的坚固程度，在将近500年以后，还被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充分地领教（1864年，湘军进攻太平天国，攻陷南京。战斗中，太平军依城凭险，节节抵抗；湘军炮轰火焚，死伤遍野，惨烈无比）。

从明太祖开始，明王朝以南京为京都共达53年（洪武元年即1368年，至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明成祖在南京夺取帝位后，出于政治上和国防上的考虑，即着手北迁的准备。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当时的北京饱受战乱之苦，人口流失，百业凋敝，根本不能充当王朝的首都，于是在永乐元年八月，朝廷下令将南京周围的苏州等10府和浙江等9省内的富商大户，强行迁往北京，以繁荣北京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永乐四年（1406年），正式下诏营建北京城。北京城的建制完全模仿南京明宫，包括

紫禁城、皇城和京城。紫禁城周长6里多。紫禁城外为皇城，周围18里，皇城外为京城，周围45里。整个工程历时14年，至永乐十八年底（1420年）基本竣工。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成祖正式离开南京，迁都北京，并规定将北京称为京师，将南京称为“留都”，以显示南京的重要地位。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明中央政府分为北、南两京的制度就被固定下来，一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甚至有史料表明，明思宗于崇祯年间还准备把首都迁回南京。

上述定都和迁都的过程可以说明，在明代，江南地区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虽然在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已不再是全国政治的中心，但政治上的独特地位依然未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的皇陵（孝陵）建在南京，龙脉之所出的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亦位于南直隶之腹心，“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出于尊祖敬宗的缘故，江南的地位不能不加以特意的维护和拔高。这个由江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特殊的政治地位，造成有明一代“政本故在南”这一基本的思维定势。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江南地区有全国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频繁的内外贸易，是支撑整个王朝的财富之源。当然，决定政治地位的还有许多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如区域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选拔，杰出人物的贡献和影响，等等。

可以代表明代江南政治地位的一个突出的实例是，明朝在北京和南京建立了两套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比如两京都有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等，连官员的品级也完全一样，接受同样要求的考察；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南京机构中还有一些独立于北京的要职，

如兵部的守备、参赞机务；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六科之一的户科给事中专职管理后湖黄册，是北京户部、户科所没有的职能，等等。虽然两者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如南京机构规模小，编制少，左职少（明代职官以左为正，右为副），缺员多，虚职多；同为阁僚，各自的权限、待遇、影响、前途显然南不及北，但两京制度存在的事实已足以证明江南地区在明代整个政治格局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南北两京制度也使明代政治具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由于政治的实权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南京官属于闲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就成为一种贬谪。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党争激化，在朝失意的官员或朝中的反对派大多集中于南京或南京周围地区，使南北政治力量出现了两个经常对立的中心。明中后期的东林党运动就是发生于此时的一个著名实例。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担任吏部郎中的江苏无锡人顾宪成，因为讨论三王并对和会推阁臣王家屏，得罪了万历皇帝，被革职还乡，在无锡的弓溪修复了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与其弟顾允成及同乡高攀龙等招徒讲学；在讲学之余，大胆地讽议北京朝政，评论当世各类人物。以后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纷纷来这里登坛讲学，一时东林书院声望大增。朝中的同情者们则遥相应和，以东林党人自我标榜，形成政治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正值六年一度的京察（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京师由东林党人杨时乔、温纯主持。于是，反东林的宣、昆、浙、齐、楚等派别的一些首领如汤宾尹之流被罢黜，东林党在北京大胜。但实际上，朝廷中一些重要职位和言路，仍然被齐、楚、浙三党盘踞，东林诸人受到普遍

的排挤。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时，主持者郑继之、李志完全听命于浙党，局面顿时翻转，南方的东林党人尽遭排斥。《明通鉴》卷75有如下记载：

“一时齐、楚、浙三党盘踞言路，相与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击异己为事。初叶向高秉政，党论方兴，言路交通铨部，指清流为东林，逐之殆尽，向高不能救。比方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一空。”

明天启三年（1623年）京察，主持者是东林党人赵南星，他写了一篇《四凶论》，痛斥齐党领袖卞诗教等四人结党乱政，使东林党的势力稍得恢复。然而不久，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从此，凡万历一代发生过纠纷的所有政治问题，全部归罪于东林党，而不得志的三党人物，如崔呈秀、阮大铖、魏广微、霍维华、杨维垣等，为了报一箭之仇，也就联合起来，共拜魏忠贤作干父、明天启帝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作干娘，走内线来打击东林。叶向高卸了职，中书汪文言因“封疆案”下了狱，魏忠贤的气焰一天比一天盛。东林中的健将高攀龙等人怒不可遏，先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发难，上本参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请天启帝立斩魏忠贤首级，以整顿朝廷纲纪。天启帝却信任太监的话，置之不理。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给事中魏大中等，也跟着上本参劾魏忠贤和崔呈秀。魏忠贤恼羞成怒，跟阮大铖等一些爪牙设下一条毒计，唆使当时的镇抚司头子许显纯（为魏党“五彪”之一，其父许从诚，明嘉靖帝的驸马），活活把汪文言打死，伪造了汪文言的供状，说在“封疆案”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和陕西副使顾大章、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等六人，受过在满洲战败的主帅熊廷弼的贿，这就是有名的“六君子案”。六人被拿下镇抚司，用五等刑罚：夹、拶、